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的特点及作用

The Feature and Fun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hristian University's Library

孟雪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教会大学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较早地将西方图书馆的理论、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等带进了中国,其馆藏文献呈现出中西兼备、文理并重的特点,采用了新式的文献组织方式,自编了图书分类法,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

[关键词] 教会大学图书馆 馆藏文献 图书馆管理

[中图分类号] G258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modern library, christian university's library brought the theor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etc of the western library into China very early. Its library collection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payed equal attention to both arts and science. The library took a new literature organizing method and book taxonomy created by itself. It played an enlightened and symbolized role in the emergency of China modern library.

[Key words] Christian university's library; Library collection presented; Library management

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它们是中国较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图书馆,虽在办馆宗旨上有较明显的精神侵略性,但客观上却对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有积极作用。西方图书馆传入中国的历史,发端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入华后便先后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数以百计

高,处理过程简单,多属于临时性的工作,其随意性强,不需要特定的馆办人员处理。

4 高校图书馆办公室延长服务时间需注意事项

为了促使馆办能在延长的服务时间创造出更加优质的服务,需要注意在时间、人员、工作种类上合理安排,提高馆办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1 馆办的服务时间在不能与本馆的开放时间平齐的情况下,应该在每周选择读者较多的时间段增加服务时间,并且根据馆办人员数量决定每周延长服务时间的总量。馆办主任作为行政管理人员,应尽量安排在传统的行政办公时间上班,全力配合馆领导的工作。

4.2 由于馆办工作的繁杂性,一些临时性的馆办工作并不需指定人员处理,这类工作能否完成,完全依赖于当班馆办人员的处理能力。所以,馆办需要提高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业务技能,在工作上做到“一专多能”,既要精通自己管辖的业务,又必须能够做到单独处理多种杂碎的馆办事务,提高办在延长服务时间里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的、有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从而开启了中国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的进程。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是随着教会大学的兴办而发展的。西方在中国共建立了16所教会大学,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各差会及基督教人士创立的共13所,分别为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

4.3 在延长服务时间里,馆办只安排一位工作人员值班,缺少监督,工作完全依赖于当班人员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馆办人员应加强主动服务的意识,否则容易养成推诿扯皮、拖拖拉拉的工作态度,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既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又会积压大量工作,还会严重影响传统办公时间的工作,同时会给别人产生一种“值闲班、不做事”的感觉。因此,加强馆内各部门之间的互相监督职能,是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有效保证。

参考文献:

- 1 唐文惠.规范 创新 高效——高校图书馆办公室管理工作初探.高校图书馆工作[J],2003(2):72-73,78
- 2 欧秀丽.关于做好高校图书馆办公室工作的思考.图书馆[J],2005(2):98-99
- 3 吴恒梅.高校图书馆办公室工作探讨.农业图书情报学刊[J],2005(6):100-101,147

[作者简介]

吴晓颖 男,1974年生,毕业于湛江师范学院,本科,湛江师范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2006-07-05]

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岭南大学,其他3所为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这些教会大学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尽管规模有限,但却起到了“为天下之先”的作用,带来了西方新式图书馆先进的办馆理念、管理方法和技术。

1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创建条件

1.1 教会大学的发展需要

图书馆在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教会大学的发展必然带动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一般教会大学都设置文、理、农、医等学院,对教学参考书的需求范围广,使图书馆文献收藏的范围涉及到哲学、中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图书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森林、农业、蚕桑以及音乐等各专业学科。

教会大学成立时的图书资料并不多,管理人员和读者也有限,一两间阅览室即可满足要求。但随着教会大学的发展,学生人数的增加,图书的不断累积,原有的空间就不适用,建立新的、独立的图书馆成为各教会大学的普遍选择。如1904年建立的圣约翰大学罗氏藏书室,在1915年扩建为罗氏图书馆;1911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其新馆于1936年建成;1911年建立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1912年建立的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其新馆在1932年建成;1916年建成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19年建成的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22年建成的山东齐鲁大学图书馆;1924年建成的江苏的东吴大学图书馆;1922年建成的齐鲁大学图书馆及1927年建成的天津工商大学图书馆。这些教会大学的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一方面证明教会大学的发展带动了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证明图书馆的发展也是教会大学的发展需要。

1.2 社会各界的捐赠捐献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与非教会大学图书馆相比,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因为教会大学均是私立的、基督的、国际性的大学,其图书馆建设经费来源多是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及机构的捐赠,政府提供的经费只惠及到个别馆。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是赵廷箴伉俪捐建的“箴惠馆”(图书馆),建资104万元^[1];东吴大学图书馆在筹建时,获得海内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大量赠书^[2];创办于1894年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影响较大,它在1904年因接受纽约市长罗氏兄弟捐款建造图书馆馆舍而改名为罗氏图书馆;1916年约大图书馆建设新馆时,约大同学和校友捐洋两万元;齐鲁大学图书馆(也称奥古士丁图书馆)是由加拿大危培革的奥古士丁长老会支会捐赠巨款建成的^[3];只有金陵大学是在1936年由政府奖助巨资,建成了新图书馆^[4]。

1.3 基督教专业人士的努力

一些教会大学里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人士在中国教会大

学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经他们努力,一些教会大学图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典范。如文华大学(华中大学的前身)在1910年就创建了被称为“文华公书林”的图书馆,它是由美国基督教徒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于1903年筹办的。韦棣华女士立志将西方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学引进中国,以启迪民智,改造中国。她将在美国四处奔走所筹得的款项用于文华书院藏书室的筹建,并于1910年正式建立了文华大学图书馆,也称“文华公书林”,是近代中国第一座新型的公共图书馆。为了让人们了解热爱图书馆,传播西方图书馆学理念,培养图书馆人才,韦棣华又投身于推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工作。在她的努力下,1920年3月,文华大学图书科得以建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象韦棣华一样在教会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外籍教士众多,如圣约翰大学的海施小姐(Florence C. Hays),原为威斯康新大学图书馆员,曾在美国历任各地图书馆职十余处;金陵大学的克乃文,曾任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回美后任维基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金陵女子大学的玛瑞安·埃文小姐(Marian Ewing)来自美国波罗拉学院图书馆。他们图书馆实践经验丰富,具有图书馆理论知识,在教会大学图书馆创建初期发挥了一定作用,使教会大学图书馆得以巩固,逐渐走上正轨并迅速发展。同一时期还有很多教会人士负责管理教会大学图书馆,他们为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尽心竭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主要特点

2.1 宗教色彩比较浓厚

教会大学开办之初就以基督精神立校,学校行政当局非常重视基督徒师生的比例,燕京大学甚至在创办初期只招收基督教教徒。华南女子大学学生信教者也非常多,据统计,该校至1926年毕业生共有38人,全部信教,其中24人在教会学校任教;193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统计,华南女院学生信奉基督教者估计在80%以上^[5]。这说明教会大学在世俗化、中国化之后,信教人数仍占一定比例。教会大学多规定在校学生必须修读宗教课程、研习圣经、参加学校举办的宗教活动如礼拜、主日学、团契等,以使学生归信基督,达到以基督教伦理培养学生“高尚情操与理想人格”的目的。教会大学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在图书馆也有体现。基督徒对宗教文献的需求较大,图书馆也很重视此类文献的收藏;早期掌握图书馆行政大权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身为基督徒的管理人员,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上也更注重公共、开放;一些教会大学基督徒团体还通过编辑出版一些宗教刊物,进行信息沟通和传教,这些刊物图书馆都有收藏,并成为特色馆藏。到1928年后,政府规定宗教科目自由选读,一些教会大学宗教活动减少,并由硬性规定到自愿参加,学校内非基督教学生的比例加大,图书

馆对宗教书刊的需求也没有早期那么强烈。但各种有关宗教活动的信息、文章仍然是学校所办的一些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

2.2 各具特色的文献收藏

教会大学不同的办学特色也使其馆藏各具特色,有些方面在全国都具有领先地位。如圣约翰大学的经济学,之江大学的工程学和商务学,东吴大学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新闻学,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学,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等,在近代中国大学中享有盛名,而这些教会大学图书馆中所收藏的相应学科文献也最为丰富。

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古籍及特色收藏较多,经多年广事罗致,借抄孤本,得不少宋元版本和明清刻本,单独辟书库收藏。值得一提的是,燕大图书馆所藏石刻拓片异常丰富,1931年夏,经燕大教授洪业(图书管理委员会主席)、顾颉刚、容希白前往大名、洛阳、曲阜等处,为燕大图书馆购得石刻拓片千余种,当年冬季又从徐瀛从处购得拓片数百种,以后陆续购藏,总计共有六千余种^[6]。另外,燕大图书馆所藏文史丛书较为完整配套,是当时国内图书馆中此类图书收藏最丰富者之一。

金陵大学的农学非常有名,早在1923年就成立了农业图书研究部,所拥有的图书资料也十分丰富。经多年收集,农业图书研究部拥有珍贵的文献资料,内容涉及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克(John Lossing Buck)的农村调查资料,包括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及森林果树等方面,对于一些难得资料,通过手工抄写进行收藏,使各种版本文献齐备,成为中国农业教育、农田水利及灾荒研究的重要基地。此外,金陵大学图书馆还有经、史、子、集共千余卷,地志及丛书收藏较多,1947年时统计有地志2 000余部、24 000余册,丛书200余部、15 000余册,共占中文书三分之一,类书主要种类也一一略备,共计70余种、5 000余册。至于元明刻本、清代殿本,及家科精本都有收藏^[7]。

东吴大学重视理科教育,生物、化学、物理类图书较多,尤其是独具特色的法学教育影响较大,法律图书收藏是其一大特色。沪江大学则以商科教育闻名,其图书馆也将商科图书收集作为重点,以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需求。

2.3 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

教会大学图书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主要体现在:

(1)图书馆藏书中西并蓄 重视外语是教会大学的主要教育特点,这一特点在教会大学图书馆藏书中体现十分明显。各教会大学图书馆几乎全都非常重视西文文献的收藏,西文文献在藏书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如1925-1926年华南女子学院图书馆英文书为4 000余册,中文书仅为1 300册^[8]。天津工商大学图书馆在1935年时有中文书6千册,英文、法文书则达到34 000多册。震旦大学图书馆的拉丁文和法文藏书也很多^[9]。20世纪30年代前的圣约翰大

学图书馆中,西文图书的藏书量和流通量均大于中文书,直到3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10]。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统计资料,也明显地反映出该校对英语及西学的偏重。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915-1923年间,共借出书刊70 726册,其中英文书刊为53 224册,中文书刊为17 502册,分别占书刊流通量的75%和25%^[11]。到20世纪30年代后,对西文文献的需求有增无减,在1933-1939年间,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共借出书刊265 394册,其中英文书刊为229 363册,占总流通量的86%,中文书刊仅36 031册,占总流通量的14%^[12]。教会大学读者对英文书刊的大量需求直接影响了图书馆的图书采购,使英文书刊成为采购的重点。

随着基督教大学的本土化、世俗化,图书馆在文献采集时的重点已不仅仅是西文文献,对中文书刊的采集也加大了力度。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运输和安全问题,使外国书刊难以运到为躲避战火而迁移到后方的教会大学,在这一时期,各教会大学图书馆图书采购多以中文书为主。因此,在20世纪30-40年代,教会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中文文献数量远远超过了西文文献的收藏量。

(2)读者身份中西兼有 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是师生们通过书刊与西方学者对话交流的场所,也是他们研究、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基地。在图书馆的读者中,中国读者当然占绝大多数,但在创校初期,教职员中的外籍人士很多,他们大多为传教士,在读者中占有一定比例。他们标榜“博爱、牺牲、服务精神,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健全人格,以应社会需求为宗旨”,将教会大学图书馆看作是传教的重要场所。教会大学虽然是相对独立的区域,但也不可能不受到中国社会潮流、革命建国、复兴民族教育运动的影响。因此,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学校的办学特色逐渐演变为重视人格教育、学术研究及服务社会三方面,而最终则为国家和社会培育英才,实现建国和改良社会的最高目标。因此,在教会大学图书馆里,既可以看到中国的学生们接受着外国传教士的宗教义理的熏陶,看着图书馆中从国外运来的各类英文参考书,学习着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用英语交流谈论着西方社会的各种问题;也可看到很多学生在图书馆中借阅有关中国革命理论及评论社会现状的图书,关心探讨国家的前途命运,很多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来推动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学生们为祖国的命运担忧,热情高涨地投入抗战和革命建国理论的宣传,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社团活动,形成了读者对中西文献都有强大需求的明显特征。

(3)分类方法中西结合 教会大学图书馆采用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一般都有较完整的组织方式和较系统的分类、目录体系,带来了西方新式文献组织方式和先进技术,使长期闭锁、落后的中国人看到和吸收了一些较为先进更为文明的东西。《杜威十进分类法》的采用和自编分类法的出现,可以说是图书管理中西结合的标志。

清末民初之时，西学东来，新书迭出，原有的四库法无法统摄，不足以概括新来学术，中国图书分类法历经了混乱时期，各图书馆图书分类出现了旧派、改革派和折中派。紧接着，西法开始输入我国，在这期间，教会大学图书馆较早师法西方图书分类，因教会大学多文理兼收，注重西方科学图书的引进，只有采用西方分类法，才能统摄各类图书。在采用的西方分类法中，以杜威十进法最为普遍。由于西方分类法不适中国国情，特别是对中国古旧书的分类，一些新分类法，如“王云五氏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等创造出来，成为中西分类法结合的经典。

3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积极意义

3.1 教会大学图书馆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是西学输入的渠道。

图书馆是教会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外基督教各差会、基督教人士和社会机构积极筹款，购买大量书刊送至中国各教会大学图书馆，在教会大学图书馆创办初期，国外书刊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虽然其中历经经济萧条、战争等因素影响，但国外赠书一直没有停止，直至教会大学撤销。这些从国外购置和赠送的书刊对我国科学、教育、经济等各方面影响非常大，传播了大量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此渠道得到传播。如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几乎全部依靠燕京的哈佛燕京学社为其选购。燕大图书管理委员会主席洪业（也是哈佛学社在燕大的执行干事）认为，哈佛收藏善本的条件比国内好，而且他们还负得起高价书款，因此规定燕大在购置中、日、朝文图书时，也要为哈佛购置一份。如果是善本、珍本或抄本，通常送到哈佛，而燕大则以影印本办法留存，燕大可以用节省的钱来购置其他的图书。这样，燕大以哈佛燕京学社为渠道，通过中西学者的访问、培训，以及两个图书馆中国、东方古籍的购置、收藏，为推动与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一种合作的有利形式。在这种交流的促进下，哈佛的哈佛燕京学社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

3.2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设立与发展，较早将西方图书馆的理论、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等带进了中国，有的教会大学图书馆后来还发展成为著名大学图书馆，其丰富的有特色的馆藏更是驰名中外。众多教会大学图书馆如燕京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华中大学图书馆、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及岭南大学图书馆，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成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教会大学图书馆还聘请了众多中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参与图书

馆工作，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重要人物，如沈祖荣、刘国钧、皮高品、洪业、吴晗、黄维廉、洪有丰、李小缘等，都曾在教会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或馆员。

3.3 教会大学图书馆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进程。

中国古代的藏书楼都以收藏为主，服务于少数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而教会大学图书馆多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图书馆的建设原则及管理思想，力破千年陈规陋习，不断扩大读者范围，制定必要的阅览条例，从而使图书馆服务技术较有改善，藏书利用率也有大幅度提高。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是基督教和教会大学最早将图书馆当成一种启迪民智的重要文化机构和服务民众的社会事业，并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教会大学图书馆采用欧美图书馆的先进管理制度和图书分类编目方法，将西方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学引进中国，在图书收集、管理与利用等方面，都引入了西方先进的办馆理念，许多做法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树立了榜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界的传统思想及服务概念的变革与进化，促进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进程，对当时中国政府创办的近代大学图书馆发展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孙海英著. 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2: 140-141
- 2 王国平编著. 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2: 71
- 3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概况. 本校印刷事务所印, 1936.6:1
- 4 私立金陵大学要览. 金陵大学总务处编印, 1947: 8
- 5,9 吴梓命, 梁元生主编. 教会大学文献目录. 第一辑: 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综览.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1998.5: 209
- 6 容媛. 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刻草目序.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22期, 1939.1: 2
- 7 私立金陵大学要览. 金陵大学总务处编印, 1947: 9
- 8 朱峰著.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9: 248
- 10 徐以骅, 韩信昌. 圣约翰大学——海上梵王渡.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9: 41
- 11 黄威廉. 罗氏图书馆史(1894-1923年). 约翰声, 1924.1:59-69
- 12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报告(1938年7月1日至1939年6月30日), 上海市档案馆圣公会档(U104-272): 92-110
- 13 黄维廉著.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印, 1932
- 14 张玮瑛, 王百强, 钱辛波主编. 燕京大学史稿. 中国人民大学, 1999.12

[作者简介]

孟雪梅 1961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毕业后在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任教，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发表论文10多篇，出版著作和教材10余部。 [收稿日期：2006-08-15]